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研讨会论文集

一石千浪

张应龙

陈剑

李万千

田英成

原不二夫

李业霖



承先启后·再绽光辉 2~3



陈凯希



导言 4~5

陈剑虹

严谨详实·引发思考 6~8



李业霖



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 9~11

原不二夫

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 12~23



田英成



马来亚劳工党与宪制斗争 24~32

李万千

浅谈意认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 33~46



陈剑

附录：时空对话与历史视野 47~52

张应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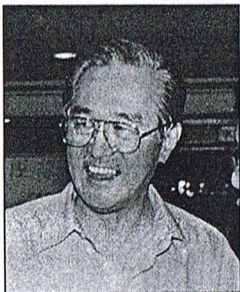
出版者：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主 编：陈剑虹
承印者：Percetakan Kum Sdn Bhd (21648-U)

承先启后·再绽光辉

--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展礼欢迎词

● 陈凯希

今天趁著佳节连接降临，我们老友在这里举行简单的聚餐交流会。承蒙大家热烈参与，尤其是新山的二百位同志，赶到浮罗交怡观光归来，路经吉隆坡歇脚，也借机会踊跃出席，我要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另一方面，我也要借这个欢乐时光，向基督徒朋友恭祝圣诞快乐，向马来族朋友恭贺 Selamat Hari Raya 以及向每一个人在新千禧年开头的 2001 年，有一个愉快、繁荣进步的新年。



依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安排在天后宫展开我们的活动，节目包括《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介礼，并且邀请了国内外数位史学家前来谈谈劳工党在五六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但由于局势微妙，气氛不大好，促使我们改变原定的计划。不过，即使我们改换了地点，我们也要珍惜今天难得的相聚交流的机会。

马来亚劳工党活跃于 1952 年至 1972 年间。虽然是短短的二十年，却是轰轰烈烈的二十年，闪烁著耀眼夺目的光辉，也面对无数残酷的挑战和打击。劳工党当时是为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目标进行奋斗。我们纯洁的理想获得无数热血青年的积极和无私的参与。我们走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血泪斑驳、可歌可泣的路程。虽然我们的奋斗已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目标，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肯定了我们以往所扮演的角色。唯一的遗憾是，种族主义还是大行其道，这跟当年劳工党提倡的非种族主义路线大相径庭。所幸的是有一批新生代的崛起，以国家民族为重，不以种族主义眼光看待问题，他们是国家

的希望。

劳工党的二十年奋斗，有她的理想，有她的目标；对社会，对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热切期望一本完整的劳工党历史的问世，展现劳工党的真实面貌，对参与劳工党斗争的人有一个交代，并且发挥承先启后的作用，也给后人一个借镜。

我们原本打算隆重的推出这一部书，并且举办一个研讨会，以志其盛，但因为前述的原因，只能低调处理推介的工作。今天，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还是如何加强民族和谐，如何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问题，以共同改革种族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劳工党的同志曾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牺牲，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热血沸腾的奔走呼号，献出自己的青春。虽然劳工党在 1972 年便被撤消注册，但是劳工党同志长期以来，还是保持昂扬的斗志，在各自的领域为民族、为社会默默的作出贡献。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并且将之视为一种荣誉，一种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曾为自己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作出重大的牺牲贡献。

今天趁著新千禧年降临之前（昨天的报章报导英国名科幻小说作者克拉克坚持 2001 年是第三个千禧年的开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别有一番意义。我们老友应继续散发生命的光与热，在人间建立温馨和平美好的社会。

在有生之年，如果大家都能保持著热心和希望，就能创造有利的条件，让大家继续有著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保持过去劳工党的精神，为这个国家和人民造福。

最后，我衷诚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导言

● 陈剑虹

2000年12月31日，马来西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劳工党斗争史》的推展礼，并计划以研讨会的形式专题讨论几项相关的学术课题。由于难以预见的客观因素，研讨会被迫取消。

这个集子收入的是原定在研讨会上提呈的书评和论文，今天辑录出版，目的在于广为流传，并收抛砖引玉之效。

集子的第一篇书评由大马著名史学家、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业霖先生撰写。李先生以他一贯绚丽的文字风格，客观地评价《劳工党斗争史》的三大优点：（一）史料丰富；（二）叙述详实；（三）语言朴质。他也实事求是的指出本书在剪裁上的缺陷，并以宋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为例，要求历史著作凝练准确。

国际友人，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原不二夫教授的第二篇书评则从原书内容入手，以民主集中制、语文政策、斗争路线作为讨论重心，剖析劳工党当年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并将之和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作一比较，得出结论说：“一个真正诚心把自己奉献于人民的政党，应该继续成为反对党，以坚持的保护人民的权益，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权益。”他也对劳工党在一些政策实践上之忽视马来群众，语重心长地给予批判。

砂劳越资深报人，中国南京大学研究学者田英成先生梳理资料，广搜口碑，写成《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1946～1970》，聚焦于砂共和人联党间的相互关系，并勾勒出其消长对左翼运动的冲击。文章将人联党历经打压后，仍旧坚持议会斗争路线



一举和劳工党退出议会杯葛大选的决定作出简析，颇发人深思。

时事评论员兼工委顾问李万千同志的《马来西亚劳工党与宪制斗争》阐述劳工党从社会民主党激化为工人党的背景与过程，论文解读了宪制斗争的渠道被堵塞后，劳工党在国内外政治气候影响下，走向群众斗争的必然性，结论则对劳工党人的重新整装再出发问题，表达了应该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看法，认为是值得鼓励的。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意识形态泛指它的政治哲学、政纲取向与政策方针，它指导政党在斗争议程上的策略，也规范党员的集体思想与行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剑（陈松洁）即从这一角度切入，对劳工党的历史发展作出分期，并对各阶段的斗争路线和策略口号作深湛的分析。他对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党内外极左思潮的泛滥归之于中国文革的影响，以及马共肃反运动的外延，这导致了党纪的失控与党风的过激，乃至党组织的最终被宣布为不存在，不能再继续扮演它的政治角色。

广州暨南大学张应龙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号《人文杂志》上的书评，对劳工党有诸多溢美之词；并说劳工党的历史是斗争史，也是建设史。我们征得了作者的同意，附录于书末，自勉勉人。

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推崇“求真”和“直书”的史德，史学家们根据确切的史料，秉笔叙事议人，以求完善化历史科学的揭示性、教育性和借鉴性社会功能。清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谏其事。”主张依个人才识辨析史实，对历史作出议论或判断。

在这样的学风认识基础上，我们期望当代的历史工作者能够凭群力创造一个无所畏惧的探索环境，重建战后大马的左翼运动历史，让百花齐放在史学的园圃里，让Clie的精神遗产永世长青，让左翼运动的奉献与牺牲彪炳史册。

严谨详实·引发思考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述评

●李业森

马来亚劳工党成立于1951年，迄1972年党的注册被吊销，从此就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马来亚劳工党走了21年崎岖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对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自由平等、反帝反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述往事，思来者”是司马迁概括了历史的功能与服务人类的作用，现在由朱齐英先生等人总结了马来亚劳工党21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出版了《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我热烈欢迎这部本国政治史的力作的问世。这是马来西亚史学史上值得庆贺的喜事，我很愿意借此机会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本书概述了从1951年5月至1972年7月的21年间，劳工党在建党前期，探索理论和摸索定位；建党之后，领导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进行宪制民主的斗争以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曲折前进的历程。四、五十年前的马来亚正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时期，人民过著艰苦的生活，水深火热，螭蜥沸羹，先进的人们为了改变现状，努力奋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建立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他们努力奋斗，坚苦卓绝，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他们做了怎样的奋斗和牺牲？他们有的在监牢里枯萎了他们美丽的生命花朵，有的甚至鲜血淋漓。本书通过图片资料和文字叙述，提供读者们有关劳工党历史一个清晰的概貌。

本书记述劳工党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重大事件发生的经过，它描绘了劳工党和人民党1957年联合组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

义阵线，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在主观上，策略的不能配搭，在客观上受到敌对集团的渗透和破坏，终于分道扬镳。其后，一度有复合的机会，但终又不能落实。生活在21世纪初的马来西亚青年，回顾前人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的英勇奋斗历程，应巍然有所警惕，从而产生工作热情和力量，为当前马来西亚伟大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马来亚劳工党党史最难著墨的恐怕是其后期的一段史实。由奉行议会民主制度转向杯葛大选，走向街头。这是一个大蜕变，党内各级领袖一个个被逮捕，锒铛入狱，以至群龙无首，也许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一些党领袖以极左姿态出现，言论偏激，跃跃欲试，这样就造成路线之争，加上敌对集团派遣代理人渗透分化，造成极度混乱、恐怖的局面。凶终隙末，分崩离析，犹如一棵大树被虫蚁蛀食，根败叶枯，党的力量，无法再凝聚起来了。

在这里我简单扼要地说出对这本党史的看法，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史料丰富，叙述周详。作者在文献、史料的选择上，下过一番工夫，参考书上，列出25种文献资料，在访问昔日的党要元老，阅读陈年的报章杂志，沙里淘金，缩龙成寸，孜孜矻矻，兢兢业业，潜心撰写，耗尽精力，功不可没。

第二，忠于历史真相。2000年写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有许多方便，不必为当时的是非为是非，秉笔直书，不必虚美，不必隐恶，和盘托出。相信当年的老同志看了，也会追怀往事，如见故人，感慨系之。

第三，可读可取可信。本书的第三个优点，是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又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所以然，夹述夹议，新意迭出。除了不厌其详罗列冗长的条文外，读起来很少沉闷之感。

当然，这部史书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我认为本书有不足之处，是剪裁工夫做得不够，如讲建党的背景，铺述得太广泛，应该精要一点。一些问题叙述得太详，若写得精简集中一些，就会更精彩。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但要论从史出，论断的语言要有概括力，而且要准确。

说到剪裁工夫，不妨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来比论一下。《资治通鉴》所采用的文献，“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他对史料的选择、删节非常讲究，他的三位助手收集整理资料约九百卷，共一千多万字，他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删成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之所以能编写成功，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是剪裁得体，叙事井然，不漏不烦。

自古文人多，良史少，历史文章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真不容易，但从基本要求来说，要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文字要准确，凝练、生动形象。《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行文流畅，明白如话，可读性很高。

我认为本书是一部可信可谈的党史，是一部严谨切实的史著，成一家之言。我们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



▲ 陈贤希（左）、巴古南（左二）、朱齐英（右二）及拉惹古玛医生（右）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推展礼上欢愉交谈。

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述评

● 原不二夫

我只不过是一个浅识的历史学家，没有真正实践过维护人民权益的行动；可我由衷的尊敬真诚为人民而斗争的人士。我实在没有权利评估马来亚劳工党伟大的历史，不过由于工委会的先生们的热情招待，我这里就提出一些浅薄的意见。



《劳工党斗争史》是一部非常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由政党所组织撰写的党史，一般上都有指责党内被击败的对手，并把一切过错和严重的失误归咎于这对手的倾向，但是这一部历史把党的主流派和异议者的目标并列，并且并不偏颇地斥责后者，对于那些从事反党活动而遭开除党籍的领袖，它也公允地加以对待，他们当日积极领导人民的活动事迹在书中获得应有的叙述，对于党史写作，特别是左翼政党来说，这该是罕有的个例。

有关马来人及印度人政治家，以及非华人组织的名称如果能够配以原名的罗马字拼音，那会更为方便读者的阅读。

在内容上，本书第74页对于泛马劳工党中央委员会之谴责共产极权主义，及其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政治路线有所批评，无论如何，我们得指出世界上大部份共产党都曾产生独裁者，苏共的斯大林，中共的毛泽东和马共的莱特都属此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例，民主集中制即是营造这一体制的中介，不过，马来亚劳工党的全国主席和总秘书都不曾是独裁者，他们极易遭受批评和开除，这显示劳工党在党内奉行民主，它绝无意建立一个独裁的共产国家，如果劳工党有缘执政，它极可能是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权，让每一个

异议分子更能自由地批评劳工党政府。

在第542至574页，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上，劳工党中央认为以马来人特权为具体表征的种族主义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大部份的马来农民在未来都会反对这项种族主义政策，事实是，马来人特权在过去的几十年并没让所有的马来人获益，在许多人还是被抛掷在后头，他们现在应该感到幻想已经破灭，不过，在有关语文问题上，没有任何马来人认为马来文不该成为国家语文，至今还有众多的马来青年无法接受大专教育，但是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政策，而不是国语政策所致。

另一方面，新加坡社阵却坚持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施行语文平等，不过，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包括社会主义政府，能够达到这一理想，正因如此，语文政策不能像其他政策般地以阶级观点作分析，我以为劳工党当时应该和既坚决又有远见地要求立马来语为国语的人民党谈商这一课题，有这样一个说法，言及傀儡政府的语文政策也压制马来语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联盟或国阵政府统治之下，马来文已经取代英文，它是不是意味著这政府已经不是一个傀儡政权？如果是这样，它在什么时候已经真正独立？

在宪制斗争及群众斗争的课题上，我可以了解当时劳工党的处境，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它已经别无选择，而必须放弃合法斗争，转而采取非法的群众斗争方式，不过，我想如果劳工党能够执行即使是些微的宪制斗争方针，它也许会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许多1960年代后期的文告和政策声明建议劳工党应该更加投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美运动以及民族团结的工作中，与其走上街头示威，劳工党为什么不能更悄悄地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活动上？

不论马来西亚劳工党采取任何政治策略，它终也不可能取得政权，如果它继续成为一个不靠种族沙文主义取巧的政党，它极可能阻遏执政党的滥权，历史告诉我们，真正为被压迫、被剥夺的下层人民而献身的政党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而掌握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枪杆子出政权”是正确的，不过，在马来西亚这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即使马共也承认这一点。

只有善于妥协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权，正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

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所显示般，当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市成为首相时，他也在基本原则作出大让步，所以，一个真正诚心把自己奉献于人民的政党应该继续成为反对党，以坚决的保护人民的权益，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权益。

1967年的劳工党中央声明说：“当前反帝反殖基本力量的华人群众，依然是这场语文斗争的主力。”如果这样的提法导致忽视马来人权益心态的产生，那它即是错误的，马共也在1941年说过当时的斗争主要力量是华人，因为他们有十多年的丰富抗日经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它说：“马来亚独立斗争的主力是马来人，因为华人的主敌不是英国，而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和美帝。”1970年代，马共自我批评了这条种族歧视路线。

本书也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名称和事实上犯下轻微的错误，第29页“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是“新民主青年团”；“马来民族党”应作“马来国民党”；第32页1946年2月胡愈之等十君子遭驱逐出境，事实是胡愈之和十君子没有关系，他是于1940年自动返回中国，第34页“劳工总会”（PMFTU）应作“职工总会”（全马职工联合总会）；布哈努汀医生应作布哈努汀博士，第606页“马来西亚民主政治运动党”应该译作“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

马来亚劳工党维护马来亚劳动人民权益的光辉历史将永不熄灭，我对它始终深表敬意。



▲ 2000年12月31日老友聚餐交流会场面一瞥。

战后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发展

(1946 ~ 1970)

● 田英成

绪言

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澜壮阔的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愿望，反帝反殖的独立运动由此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展开。

经受过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星马婆（汶莱、砂劳越与沙巴），在战后所展开的独立解放运动，冲击着殖民统治的政权。英殖民主义者为了继续在幕后操纵，确保其政治与经济的利益，最终成功将砂沙并入马来西亚的版图。尽管这一场左翼政治运动遭到无情的镇压，然而波澜壮阔的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回响，已写下了历史悲壮的一页。

砂劳越于二战后让渡于英国，成为英国殖民地。亚非诸多殖民地在战后，风起云涌争取独立运动，砂劳越不仅不因此成为独立国，反而纳入英帝国的版图。然而，也因为如此，砂劳越人民在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之后，与星马一样掀起了反帝反殖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砂劳越人民民族主义意识的成长，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意识。

民族解放浪潮的冲击

中国的长期内战到1949年时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海外的左翼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特别是在星马婆一带，左翼运动以华人核心，他们在



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内展开了对当时英殖民主义者的斗争，马共潜入森林进行游击战，更为举世瞩目。

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左倾思想明显影响了砂劳越年轻的华人知识分子，部份青年向往共产统治下的中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估计由1950年至1956年数年间返回中国的年青人逾千人。这一时期，青年中学生组织罢课行动，通过反殖地主义展开斗争发展左翼力量，结果导致英殖民地政府采取镇压手段，封闭社团、报馆以及大逮捕，并且驱逐不需要人士返回中国。这是反殖运动的开始。1954年12月，砂劳越立法议会批准挂营业税，这项抽税有些竟高达1,000%，由1955年正月1日开始生效，一时华人社会群情沸腾。泗里街中华商会于圣诞节召开抗议大会，通过在新的一年里头十天罢市。民丹莪、诗巫、古晋紧跟于后，罢市稍后蔓延至民都鲁、美里乃至全州，各地代表齐聚古晋，向当局表达不满。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声中，英政府被迫延迟实行新税率，设立调查庭，在两个月之后向立法议会提呈一份经过修正的法案，大大减低税率。这一事件，使华人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新马所掀起的反帝反殖运动，正好给共产主义在民族运动的掩护下找到一个出路。五十年代开始，砂劳越已有砂劳越解放同盟的秘密组织，目的是反英反殖，并且企图建立婆罗洲三邦共和国。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于1963年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其成员主要来自华人社会，对砂劳越华人社会影响甚大。

随著新马反殖运动的热烈展开，砂劳越深受影响。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这个由李光耀领导的政党，原是靠著左翼职工运动起家。行动党提出的“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祖国独立”的口号，激励了砂劳越的反殖运动。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也达到高潮，由马来亚劳工党、人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在1957年成立了广泛的统一阵线——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大家携手合作，把矛头对准马来亚联盟政权。社阵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在各级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国会与州议会的席位，并且赢得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

鼓舞了砂劳越左翼人士组织政党的热忱。

反大马运动风起云涌

在国内外有利的政治形势下，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在1959年6月4日成立，开创了政党政治的先河，该党由一群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发起，之后受华文教育者与职工运动者大量参与，对该党带来很大的影响。党主席王其辉是一位银行家，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一位执业律师。在34名发起人当中，有数名职工运动者，他们是砂共的成员，在数年后参与砂共发动的武装斗争。人联党虽说是一个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初期的党员有不少是伊班族的党员，但它基本上是以华族为基础的政党。

人民联合党在“建党宣言”揭示其成立宗旨：

- (一) 循宪制途径争取砂劳越独立；
- (二) 建立议会民主的政府；
- (三) 促进及确保各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经济状况；
- (四) 维持各民族的和谐与团结。

人联党很快的发展成为砂劳越最大政党，在1962年9月该党已成立18个支部及34个分部，党员从1959年的3,627人增加到1962年40,400人。

由于人联党的迅速发展，英殖民政府感到不安，因此，便在1961年11月2日在立法议会通过《居住地限制法令》，企图对该党的发展进行钳制。这项法令剥夺人身自由，和限制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不合理措施，人联党于是展开了全州性的群众集会，反对这个法令的实施。

1961年11月4日晚上，在人联党总部举行了一个规模庞大、情绪高昂的“追悼民主死亡大会”，抗议《居住地限制法令》的实施，出席人数超过五千人，在诗巫、美里、成邦江及众多支分部所发动的群众集会，都有数千人参加，反对这项违反民主及不合理的法令。这项群众性的运动，展示了人联党广泛的群众基础，震惊了英殖民地政府。

1961年5月27日马来西亚联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建议由马来西亚、新加坡、砂劳越、北婆罗洲(沙巴)及汶莱组成马来西亚，这就是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这项计划的提出，不仅在于能更有效地应付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而且将通过新的宪制安排，使新加坡和北婆三邦获得独立。其次，新联邦政体之组织模式将平衡各民族人口间之差异，而且也符合巫统党内在1956-1960年间对婆罗洲土著人民地位所定下的政策，承认他们为马来民族一部份，很快的，五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马来亚劳工党即时反应，提出当前的要务是大力推行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合并，而不是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秘书长杨国斯向报界声明：“实行五邦大联合，须在砂劳越独立后才能办到。我邦在跟新、马联合前，必须与北婆先行联合，由小联合达到大联合”。

1962年1月27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举行。经过数日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会议欢迎联合邦、星洲、砂劳越、汶莱和北婆人民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并希望这种合作在未来的年头里，可以为此区域带来和平与安宁。……马来西亚的概念在会上受到考虑，会议支持汶莱和砂劳越代表所表示的明确态度，即马来西亚概念在未受到进一步之考验前，必先有英属婆罗洲三邦的自主权。……”上述公报由出席大会的政党首席代表签署，计(一)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二)新加坡工人党；(三)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四)新加坡人民党；(五)马来亚人民党；(六)汶莱人民党；(七)马来亚劳工党。

尽管左翼反对党联合阵线对马来西亚作出激烈的反对，但英国政府已立意通过马来亚联盟政府积极进行此项计划。在砂劳越各民族当中，华族基本上倾向于反大马计划，并且取得部份达雅族的支持。1962年2月19日，葛波德民意调查团抵古晋，人联党发动了一个群众集会，人数逾1万2千人，反对组织大马的建议。接著全州各支部陆续举行反对的集会，并纷纷组成代表团晋见调查团，表达反大马的立场。这种声势浩大的反大马计划，震惊了英殖民政府，于是展开了逮捕人联党重要干部的行动，企图镇压反大马的声势。

1962年8月中旬，葛波德民意调查团报告公布，结论是：赞成加入大马的砂劳越人民比反对加入大马者来得多，然而人联党仍然进行反对大马计划，并且组成访问联合国代表团。1962年11月底，联合国书面通知，接受人联党在12月中的联合国会议上，听取他们反大马的申诉，代表团准备在12月初动身前往菲律宾和汶莱人民党的阿查哈里会合，然后，前往联合国进行申诉，不料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向联合国的申诉计划也因而暂时被搁置不能成功。

人联党所持的反大马立场主要是基于这是英国的一项阴谋。英国坚持要马来西亚接管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而马来西亚要以土著占多数的英婆三邦来抵消民族的不平衡；婆罗洲三邦的国家主义者对此都表示不满，砂劳越一百多年来是个有自己的人民和特征的政治单位，因此不愿意同其他国家合并，除非得到大多数人民同意。

砂共发动武装斗争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的浪潮，波及砂劳越和沙巴。英国向这洋九般的苏丹国派遣大批军队，并有空军和海军参战，澳洲和纽西兰出兵镇压，东姑阿都拉曼也从马来西亚派出一支200人的特种警察去汶莱。

经过数天激战，起义被镇压，12月20日，苏丹取缔人民党，解散了立法议会，停止实施宪法，对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开始大规模的逮捕和迫害。

汶莱人民党起义，给英殖民地政府制造了机会，大肆逮捕砂劳越左翼人士，包括人联党的干部和砂共成员。1962年12月11日至16日之间，当局在砂劳越各省共逮捕四十八名左翼积极分子，当中有半数以上是人联党的中央委员与支分部主要干部，在风声鹤唳的紧急情况下，砂共领导人号召其成员潜往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当时的苏加诺政权极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印尼共产党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印尼为砂共提供从事武装军事训练的天地。

1963年初估计，从砂劳越潜往印尼边境的青年男女，不下二千人；同年7月更超过6千人，在山口洋与坤甸一带活动，他们视此区为边区，易与砂劳越取得联系。

砂劳越警方在得悉众多青年潜逃后，即在古晋发表声明，强调根据公安条例规定，一间住屋的屋主或居住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呈报该屋内任何居住者的不寻常失踪的子女；他们的家长或监护人，亦须呈报，若不向县长、砂劳越行政官、土民官或任何警官呈报这类失踪案，犯者可被处两年监禁及五千元之罚款。

政府发言人针对那批逃亡青年警告称，他们非法离开砂劳越，其公民权将被取消，永远不能返回本邦。

在逃亡越境者中，有许多是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党员，警方曾在一次追剿行动中，逮捕六十九名青年，其中有二十名携有人民联合党的襟章，事实上，人民联合党在开始组成时已被共产份子渗透，这是公开的秘密。

1963年初时，政府当局曾公开揭露砂劳越共产组织已经命令其成员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要他们从事武装斗争，这从搜获的秘密文件中得到证明；而人民联合党党员也被训令潜往印尼。

潜往印尼的共产份子中，叶存厚、杨柱中、黄纪作与林和贵是著名的领导人，叶、杨是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中委，而林和贵自学生时代即已是秘密共产组织的领袖。

1963年，砂共的武装斗争已在印尼边区取得立足点，于1962年中回返中国的文铭权出任砂共政治局主席，确立了砂共党魁的地位。

自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期间，砂共的许多成员越过砂州边境，进入印尼接受游击战训练，这段期间，正是印尼苏加诺政权加剧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因此砂共的武装斗争取得成长的机会，仍然潜伏在砂劳越境内的砂共成员，则积极争取民间的经济支援，接济印尼边境的部队。

在马印对抗期间，砂劳越的保安部队着重应付对抗的威胁，在砂州境内的共党份子趁机准备安全的基地，以备供给边境武装份子日后回来之用，乡村地区的青年，有些已被训练及被组织成为作战

队伍，而在土著间进行民族统战工作，增加了武装斗争的后备力量。

砂共在第一省及第二省边境一带，建立一个指导委员会来支配武装斗争。这个指导委员会与州内其他各省的共产高级干部保持联系，策划各种活动。这个委员会主持一个叫挺进队的组织，在很多方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秘密武装组织类似。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一场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很快遭到挫折，但它对马来西亚却产生直接的影响。印尼右派军人认为，这场政变乃是中共在幕后指使和支持，印尼反共的回教青年学生即掀起一波波反中共、反华人的示威活动。1966年3月间，掌握兵权的苏哈多迫使苏加诺签署一项授权书，使苏哈多掌握了政权与军权。苏哈多当政后，随即宣布取缔共产党，逮捕亲共份子，估计印共成员被杀者逾五十万人。

苏哈多的反共政策，对活跃于砂印边区的砂共成员，无疑是惨重的打击。除了终止“粉碎马来西亚”行动，更逼使砂共武装部队撤返两国交界的险峻山区。

情势迅速变化，当新的武装斗争政策确定之后，砂共的先头部队，被遣返砂劳越，为将返回的武装份子的流入而铺路。在1969年后半期，武装份子的流入达至高峰。

回返的武装份子，主要分布在第一省、第二省与第三省。只有残余的部队留在印尼属的加里曼丹，保留基地，以便双方配合。

1969年之后，砂共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攻击，政府军疲于奔命，耗费了大量的物资。1970年初，政府军在“鲁诺”地区所展开的著名军事行动——“巨网行动”，使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受到重创。第三省拉让江流域，更是砂共武装份子出没之地。在这地带所发生的无数次战役，使砂劳越人民蒙受战乱损失，许多居民为此而迁至其他省份居住。

人联党的困境与突破

尽管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及周边国家包括印尼的激烈反对，马来

西亚联邦仍然在1963年9月16日依计成立。大马成立之后，政府对左翼政治活动的镇压，更加猖狂。人联党的华裔重要干部，不断遭受逮捕监禁；对党内的伊班族领袖，也不断受威胁利诱退党。这类压制手段，使人联党的领导与运作面对严峻考验，反大马计划的斗争锐气尽失。

当砂劳越成为大马的一州之后，1964年直到1969年大选之前这段时期，人联党的党务进展受到诸多阻碍。该党秘书长杨国斯在1968年6月间的党员代表大会发言指出：“由1964年6月第四届党代表大会举行后直到去年（1967年）为止，党的活动有停滞下来的现象，其原因有四：（一）当时所谓印尼与大马对抗，军事活动使正常之政治活动发生大困难，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为甚；（二）对抗期间实施多种紧急法令，使该党在各方面都受限制；（三）政府逮捕党的工作人员、干部，封闭党的支部，使各支部受到很大的打击；（四）党的经济上困难。”

人联党的许多支部遭到封闭，政府不准其活动，使到砂共在公开阵线的活动受到挫折。事实上，许多武装份子乃是人联党乡村地区的干部。在人力与物力的支援方面，乡村地区的人联党干部扮演积极的角色。

对于政府的逮捕行动，人联党领袖大力谴责是可以理解的。该党助理秘书长田绍照在1968年6月10日的一项群众大会上发言：“将来，人民对议会民主失去信心而采取武力斗争，联盟政府对此须负全部责任。”稍后，砂劳越联盟总部针对此言论发表文告，谴责此种煽动武力斗争的论调对于多元种族杂处的砂劳越和马来西亚是极度危险的。

砂劳越州大选，原定于1969年进行，由于1969年马来半岛发生五一三种族暴乱事件，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砂州的大选因而展延至1970年举行。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单独执政。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乃被提出。人联党在华人所集中的城市选区得到相当高的拥护，所得总票数也冠于各党，它之被邀参与内阁为势所需。另一方面，多年的紧急状态，该党的干部相继被捕，加以经济的困难，该党领导层似也认为只有参加州内阁方能解

除困境·此外，种族间的合作也成为参与州政府的因素。

1970年中人联党参加州联合政府，杨国斯出任副首席部长。1971年2月间，杨氏于回答记者的询问时表示，在州政府方面，人联党是属执政党，但在国会中则应该属于反对党。

这种局面只维持短暂的时间，稍后由于该党主席出任联邦部长，国会中反对党随之成为执政党的成员之一。

人联党的参与州内阁，一时使到砂共组织进退维谷，早年人联党的容共至今则已开始反共，这种政策的转变，使砂共有失去统战效力的感觉。杨国斯于1971年9月间的党代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

“在苏加诺对抗时期，党内的一些极端份子与共产份子，投到苏加诺去，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企图利用外国形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成为苏加诺的工具，以致当苏加诺倒台时，他们的命运也跟著完结，他们一定是失败的，因为人民不支持他们……他们放弃了宪制斗争与议会民主思想，他们出卖了党，……由于他们的反国家暴力行动，使一些无知的人民，怀疑我党的立场，有一些甚至以为我党支持暴力与武装斗争，……这些极端份子和叛党者，给党带来极大的破坏。”

人民联合党的参加州联合政府，砂共绝对不会同意，但他们也不会就此弃人联党于不顾，为了应付这个新发展，砂共组织于1970年8月间发出一项新指示，希望人联党失去效力，或者施计使它返回统一战线，文件指出：

“砂劳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的几年内是积极反帝、反殖、反伪马的，其领导层也有工农的代表参加，并且在许多重要政策问题上起了主导作用。后来，由于反动政府的再三逮捕，“人联”的领导层只剩下了反动派满意的人物，这样一来，“人联”的领导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机构了。”

“因此，“人联”已经不能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工具，在“大选”后，由“人联”和联盟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已经把“人联”的领导层变成了封建官僚买办集团的附庸和反动工具来压迫和剥削人民。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须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民主人士过来，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广大的“人联”党员应该继续拥护“人联”领导层吗？不能，因为他们已充当了封建官僚买办的工具了。”

“我们坚决和“人联”决裂吗？相信在我们的号召下，必定有大批的“人联”党员会退出“人联”，而使“人联”成为有名无实的空壳。但是，这样一来，就太便宜了那些代表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公开政党”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因此，我们的策略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时留有余地”，根据“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我们就必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提出适当的政治口号，动员“人联”党员来迫使“人联”的领导层去执行这些政治口号，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人联”党员和群众迫使“人联”领导层实现解放“新村”和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实现不了就应退出“联合政府”，迫使“联合政府”倒台。”

“最高的要求是使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反共也不反对武装斗争……。”

“最低的要求是使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继续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向封建官僚买办投降，并在领导层中清除封建官僚买办份子，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侵略。”

自联合政府成立后，人联党直接执行剿共政策，使砂共地下份子不易受到掩护，另一方面，参与武装斗争者相继投诚，谴责武装斗争的行为，加以政府积极剿共，局势的逆转，逼使砂共于1974年接受斯里阿曼条件，导致百分八十之兵员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由洪楚廷领导的残余部队，直到1990年，始接受政府条件，走出森林，从而结束近三十年森林里的斗争。

结论

砂劳越的左翼运动乃是战后政治运动的主流，这一运动的终极

目标是争取砂劳越的解放独立，联合汶莱、沙巴成立北加里曼丹共和国。

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的镇压，左翼运动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作为公开政党，人民联合党在1959年6月4日成立，直到1970年参加联合政府，这整10年间，该党领导人与基层干部不断受到联合政府以《居住地限制法令》与《内安法令》的逮捕与监禁，对党的运作打击甚大，但由于该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参加1970年的州大选仍然取得相当数量的议席，从而与其他多个土著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在这之前，砂共领导人曾有意展开抵制大选的行动，但由于人联党中央领导人坚持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最终改变了人联党的命运，就这方面来看，劳工党抵制1969年的大选，无疑是自我放弃议会斗争的道路，这固然是联盟政府对劳工党的大肆逮捕与镇压，使该党意识到议会的民主斗争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劳工党彭亨州分部对1969年州国竞选的意见书指出：“我们认为目前反动派对我党的迫害，大逮捕、封闭党支部等行动，在在显示了反动派进一步破坏和剥夺了人民民主权利，但并没有完全阻塞合法的宪制斗争，因此，我们认为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应敢于和善于掌握议会斗争的正确目标，起著暴露敌人和善于教育人民的真正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参加议会的选举手段，宣传和教育群众的方式，让群众加深了解反动派的实质和认清议会选举的真面目。”

但劳工党在当年极左路线的主导下，终于在1969年全国大选前，宣布议员集体辞职并杯葛应届大选，该党在三年后即1972年宣告结束活动。

人民联合党与劳工党坚持多元种族政治路线，两党基本上是由华族领导，但在不同时空下，两党所展开的斗争策略也有所差异，这结果是两党的政治命运完全不同。

战后在新马和北婆三邦所掀起的左翼政治运动，尽管遭到无情的镇压与迫害，但它所引起的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仍有待识者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资料：

- 一) 邓伦奇、蔡存雄、沈庆辉编：《渴望人联三十年》，一九八五年。
- 二) 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二零零零年。
- 三) 朱齐英执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二零零零年。
- 四) 《默武共产主义在砂劳越的威胁》，马来西亚内政部印行，一九九一年。
- 五) 田农：《森林里的斗争——砂劳越共产组织研究》，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一九九零年。
- 六) 杨国新：《人生奋斗政治经验》，自费印刷，一九八八年。

2000年12月中旬

马来亚劳工党 与宪制斗争

● 李万千

（一）引言

马来亚劳工党的历史，虽然只是短短的20年（1952~1972），但它作为一个宪制政党的正反斗争经验却是十分丰富的，它的诞生、蜕变、革命化和结束，经历了作为议会民主橱窗、从事议会斗争、批判议会迷思想、以群众斗争作为主要政治路线及最终被迫放弃议会道路的完整过程，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议会选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说明了议会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是行不通的。



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体而言，并不利于我国群众斗争及（边境）武装斗争的发展，我国的左翼运动实际上已经陷入空前的低潮，除了出现信念危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之外，在组织和影响力方面，也大大地缩小了，甚至存在著断层的危机。

本文除了将简略地回顾一下马来亚劳工党宪制斗争的历程，也将触及一些前劳工党及左翼人士，若在当前新的政治形势下要再重新出发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英殖民政府实施“议会民主”的背景

日本法西斯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由于马共在该党总书记莱特的出卖下，并未采取主动，开展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以赢取我国的独立，建立《抗日九大纲领》所主张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相反的，却推出了《马来亚和平民主运动八大纲领》，并自行解除武

装，试图通过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争取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

结果英殖民政府在重返马来亚站稳阵脚后，遂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两天后就在全国对左翼党团进行大镇压，约有近万名领袖和干部被捕，三百多个组织被封禁，在惨遭全面镇压之后，马共才在陈平的领导下，决心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正式开展抗英武装斗争。

英殖民政府在进行残酷的暴力镇压的同时，也开始实施“议会民主”的骗局，以缓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家自治与独立的强烈要求，“议会民主”首先于1949年在新加坡实施，在联合邦，则于1951年底及1952初先后举行乔治自治市及吉隆坡自治市选举，接著才在全国29个市镇举行市选。

为了演好市选的政治闹剧，殖民政府除了扶持既有的巫统、马华等政党参选外，也鼓励一些亲殖的专业人士、职工会领袖及公务员组织新政党，作为民主的橱窗，檳城、雪州、霹雳、马六甲、森美兰等区域性的劳工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上述5单位加上新加坡劳工党及吉打州的Saberkas共7个单位，在1952年6月26日成立“泛马劳工党”，它基本上是一个反共亲英的机会主义政党。

上述史实证明，“暴力镇压”与“议会欺骗”是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反动两手，而初期劳工党正是作为英殖民主义“议会骗局”的“民主橱窗”而成立的。

（三）摆脱亲殖机会主义者的控制

在1953年，由于檳城及吉隆坡一批费边社会主义者如拉玛纳旦、陈朴根、李国良、威拉班、巴古南、黄添寿、崔耀才、陈志勤等人的加入，使劳工党逐渐摆脱亲殖机会主义者的控制。

1954年，党通过新党章，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8项宗旨，包括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自主及民主的马来亚国；与马来亚境内各工人、农民、社会主义及合作社等组织取得合作，遵照党章进行联合政治活动，为劳心或劳力者争取劳动的十足成果；及普

遍促进人民，特别是劳心和劳力者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上的解放等。

改革后，党也要求英殖民地政府结束我国的紧急状态，宣布全国为“白区”，显示了反殖的立场。

（四）参加联合邦自治普选

在1955年联合邦自治普选中，华巫印联盟囊括了52席中的51席，劳工党只派出4名候选人，虽然皆告败北，但在竞选宣传方面却有不俗的表现，它发表了32点宣言和16点政纲，相当全面地制定了党各方面的有关政策和主张，使劳工党成为当时最能代表我国各族工农阶级与基层人民利益的宪制政党，为往后的宪制斗争奠定了基础。

劳工党在联盟取得自治普选大胜后，要求它兑现结束紧急状态及促使它接受马共和谈的建议，劳工党雪州代主席陈传文甚至认为马共既然答应以宪制途径争取独立，政府应承认它成为合法政党，然而由于东姑忠心耿耿地执行英殖民政府的招降计划及剥夺马共的宪制权利，和谈遂以失败告终，华玲和谈失败把我国的和平推迟了34年，直到1989年底国阵政府与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在泰马边境的武装斗争才正式宣告结束。

（五）反对独立协定和联合邦新宪法

1956年初，东姑率领联盟独立代表团到伦敦与英殖民部进行谈判，结果达致数项不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协定，引起劳工党的抗议和反对，有关条文为：

- 英国答应让马来亚（不包括新加坡）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 英国继续负责马来亚的防务为时18个月；
- 马来亚独立后，和英国签订《英马防务援助协定》；
- 英国任命一个独立性的宪制调查团，负责起草马来亚新宪法。

其实，在东姑赴英谈判之前，劳工党已经向他提呈了一份含11点具体建议的备忘录，内容包括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马来亚人的马来亚、统一国籍与出生地公民权原则、各民族权利和义务同

等等，都是比较符合人民的要求的，因此，劳工党反对上述协定是很自然的。

1957年7月3日，当局在报上公布了马来新宪法，劳工党在8月26日全国代表大会上抗议新宪法反民主及维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的要求：独立日大赦所有被扣留的政党及工运人士，并允许被英政府驱逐的人士回马；尽速结束紧急状态；澳、纽军队撤离马来亚。

（六）社阵的成立和解散

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是我国独立日，即1957年8月31日在吉隆坡宣告成立，社阵首先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于稍后才加入，人民党成立于1955年11月11日，由著名的马来民族主义者阿末布斯达曼领导，该党信仰无产主义（Marhaenizm），以社会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建国基础，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于1954年8月2日由工运领袖V大卫所创立，过后由学运领袖郑文波领导，它于1958年10月1日被当局援引紧急法令宣布为非法组织，该党主席郑文波及多名领导人在同一天被捕，当天全国共有109人在大逮捕行动中失去自由，是我国独立后第一次大镇压。

社阵无疑是独立后，我国宪制斗争中最具社会主义思想，以各族工农群众为主导，联合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人民党的组织对象主要是乡区的马来农民，而劳工党则以城乡的华族工农群众为主，社青被封禁后，一些成员便加入人民党进行活动。

社阵由独立日成立，至1965年12月10日，人民党决定退出解散为止，这是战后我国左翼宪制斗争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阵时期，人劳两党在地方议会、州议会及国会各级议会的竞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支援工、农、渔、妇女、扣留营等各阶层人民的运动和斗争；及在国际上援越抗美等方面都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取得显著的成绩。

人民党在1965年决定退出社阵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也无须把责任单独归咎于任何党，教育问题的分歧无疑是一个导火线，但更重要的是许多领导人被捕，一些人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2·13之后），敌敌及内部各种坏份子的兴风作浪，矛盾未能获得及时的协调和解决等。由于存在着上述各种不利的因素，结果本来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被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导致社阵的最终解散。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加以吸取的。

（七）议会选举的得失

蜕变后的劳工党对议会民主的骗局虽然有所认识，但一般上主张，在议会斗争的道路还没有完全被堵塞，民主的招牌还没有拿下来之前，应充份加以利用，以暴露反动派的假民主及各种不利人民的施政。此外，亦可通过进行议会斗争来锻炼干部与组织群众。

因此，劳工党在人民党的配合下，积极地参与了地方议会、市议会、州议会及国会各级议会的竞选活动，并取得可观的成绩。特别是在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中，社阵大有收获。例如有1959年，社阵已控制乔治市议会及沙登、增江等地方议会，并在全国拥有20名市议员及146名地方议员。

1960年，它进一步执政雪州的丹絨士拔、森州的知知港、亚沙新村、吉打州的西岭和彭亨州的明光等地方议会。

1961年，社阵进一步获得马六甲市政权，全国中选的市议员增至71名，地方议员增至258名。1963年，社阵除了保住乔治市及马六甲政权之外，还夺得居銮、芙蓉和文冬三个市政权，使社阵执政的市议会增至5个。

必须指出的是，联盟在1961年的市选中，得票总数为218416张，席位426个；反对党得票总数226112张，席位仅得152个。在1963年的市选中，联盟得票总数为252160张，席位411个；反对党得票总数263422张，席位仅得169个。两次市选，都显示联盟得票虽少过反对党，但席位则多出一倍有余。这充分说明，早在60年代联盟已经在选区划分方面作手脚，以确保它的政权。

此外，联盟更通过颠覆、收买，或利用个别社阵议员滥权渎职

的事件，强行接管社阵执政的市议会，包括新山、芙蓉、马六甲和乔治市等。接著，为了根除社阵在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联盟政权索性在《地方政府选举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发表之后，取消市议会与地方议会的选举，这当然是我国议会民主虚伪性的大暴露。

在国会和州议会选举方面，社阵参加了1959年及1964年的两届大选。1959年参选结果，获得8国16州，成绩还算不错。1964年，由于在选举前不断遭受镇压及受到马印对抗事件的影响，社阵虽然派出63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及162位州议员候选人的强大阵容，结果只有2国8州当选，可说是惨败。

（八）批判议会迷思想与群众斗争路线的确立

1963年新加坡选举及1964年马来半岛的大选，左翼在强大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对夺取新加坡及联邦一些州的政权都曾有过颇高的期望，选举结果令左翼大失所望。

配合当时国际上中共大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和平过渡”，及在中国国内反对最大走资派的反修防修运动，劳工党中央在新加坡李绍祖极左集团及党内反右分、支部的冲击下，也竖起批判党内议会迷思想的旗帜。

劳工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议会迷思想是和该党由社会民主党革命化为工人党的过程分不开的。这过程以1965年2·13群众斗争的开展；接受党中央五巨头，即魏利煌、林建寿、V大卫、黄汉德及陈志勤的集体辞职及9·24特代会以科学的工人阶级思想统一全党，并确立“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政治路线等为主要标志。

9·24过后，劳工党就接二连三地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主要的有10·30反约翰逊访问；4·28支持阿沙汉因丘工潮；6·2支援政治扣留者绝食斗争等，突破合法主义的框框，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劳工党接著在1967年10月21日-22日在檳城召开了第13届代表大会，为大会所接纳的主席讲词、政治报告和大会议决案把党的政治路线继续“激进化”和“革命化”。13大可说是一个充满

革命激情，准备以群众斗争为主要手段，迎向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誓师大会。

紧接著13大的胜利召开，槟州劳工党分部在11月24日领导了轰动国内外的反旧币贬值的总罢市运动，可说是当时动员最全面、规模最大的群众斗争，只可惜它最终为种族极端份子所乘，酿成不幸的种族冲突事件。

在频繁的群众斗争的冲击下，联盟政权加剧了它的暴力镇压，也收起了它的“议会民主”的假面具，先后把槟州、雪州和柔州三个分部及全国36个支部加以镇压和封禁，并无理逮捕百余名各级党领袖和干部，追缉为数众多的在逃避难者，使党的组织和正常运作遭到严重的破坏。

尽管这样，党还是在革命思潮的鼓舞下，准备即使联盟政权把党封了，还是要以不同的形式，把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九）杯葛1969年大选

在联盟政权全面镇压与堵塞议会道路的情况下，劳工党迟早必须面对是否放弃议会斗争的问题；而当时国内外“极左”思潮的泛滥，及劳工党的“革命化”与“以群众斗争为主”路线的确立与贯彻，更加速了“议会民主”虚伪性的全面暴露。

最先把有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吉打州分部在1968年1月16日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文章明显地在酝酿议员辞职和杯葛1969年大选，文章问道：“因为联盟反动派封党封团，抓人杀人，连州议员国会议员都抓了，也都不必经过审判而监禁起来，选民都不被看在眼里，做议员还有什么用途？市乡议会都会被关闭和接管，议员都要失业失职，做议员没法在议会里替人民讲话，做议员还有什么意义呢？”又说：“如果形势发展需要对选举或议会实行抵制，才能最有效地暴露英拉集团，也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和决定。”

到1968年6月4日，吉打州分部发表《劳工党吉打州分部对1969年大选的意见》，明确主张杯葛1969年应属大选。同年9月28日及29日，党中央召开各州代表扩大会议，除了彭亨州外，各

州都坚决要求杯葛该届大选。

1968年10月31日，雪州人民党分部率先宣布各级议员辞职并且杯葛应属大选。11月9日，联盟政权又在全国展开大逮捕行动，共148名各界人士被捕。12月3日，劳工党中央号召各级议员辞职以抗议民主的沦亡，并罗列11项课题要求政府解决，否则杯葛应属大选，议员辞职的号召得到良好的响应，说明党同志对议会道路已丧失信心。林顺成同志被枪杀及5月9日的出殡游行，把杯葛大选的运动推向高潮。

5·13事件掀开了军政统治的序幕，也为当时劳工党的宪制斗争划上休止符。1972年社团注册官以该党多年没有呈交常年报告书为借口，正式取消该党的注册，劳工党的斗争史也就告一段落。

（十）关于劳工党人再出发的问题

历史有时好像在嘲弄著它舞台上的演员。20世纪60年代末，劳工党人和当时从事宪制斗争的左翼党团和人士，都由于识穿联盟政权的暴力专政的本质及议会民主的骗局，而毅然开展对议会主义及和平过渡等改良思想的批判，确立了以群众斗争为主的路线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结果历史的进程无情地否定了劳工党人及其他左翼人士对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政治策略的部署，使他们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国内的政治运动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其政治影响力也降到最低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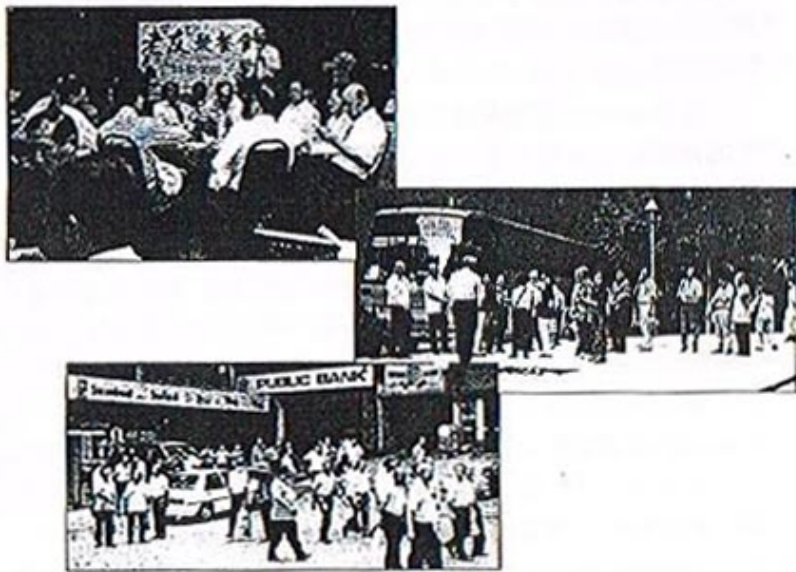
就在这些前左翼人士由于产生信念危机或其他生活因素而逐渐去政治化，对政治越来越疏离的时候，我国政治局势在区域性民主开放大潮，及安华事件的发生和演变的冲击下，终于再度出现新局面。久违的群众斗争的场面不但重新出现，而且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及有利的条件。更引人关注的是以马来人为主的烈火莫熄政治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再度提出应以街头政治为主或议会斗争为主的议题。历史似乎在重覆，但绝对不是原地踏步。

在新的政治局势的激励下，前劳工党人有必要重新确认是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问题。若以该党13大议决案所明确写明的

“党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能够有助于推动马来亚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党，即有能力参与推动马来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显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劳工党并未也不可能完成上述历史使命。

一些前劳工党人，如果在目前的政治局势的感召下决定再出发，也必须结合目前的政治现实进行学习和再认识，重新为本身应扮演及能够扮演的角色定位。关于完成历史使命的问题也不可能是把过去的一套硬搬过来，或不顾主客观条件及历史时空的不同，而教条地理解其延续性。总之，必须对目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如何，再出发是值得鼓励的，也应有适当的人起带头作用。在我们有生之年，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之前，若能够为促进一个更为民主、廉洁、公正、进步、繁荣的社会作出我们的贡献，毕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及光荣的事！

完稿于2000年圣诞节



浅谈意识形态与 劳工党的斗争

● 陈剑

意识形态简释

首先，让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涵意做个简单的说明。“意识形态”原自英文“Ideology”一词，即从观念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意思是观念的科学。

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念可说是意识形态的雏形，到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始祖法兰西斯·培根提出“四假相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概念的起始。其后，有约翰洛克对“观念”的哲学阐释，认为人的理智能把简单的观念组合成复合的观念，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进一步催生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和阐释应始于法国的启蒙运动。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并立之为观念科学的是法国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学者德斯杜·德·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写了《意识形态的要素》(一译《意识形态的基础》)一书，对中世纪以来充斥哲学中的偏见和神学观点进行理性的批判，他主张以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以之为所有科学的基础。托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以理性对思想来源进行剖析，从而揭示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一致，托拉西对意识形态的诠释对后来各种意识形态学说产生极大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理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派系。第一派即是始于托拉西，一直到20世纪的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英法及后来的美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推崇理性，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驾驭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与自然科学一致，因此，凡符合这法则的社会理论便给予肯定，否则便贬斥。这一派最



主要的发展是否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重大作用，并视之为社会问题的根源。

另一派便是源自德国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经由马克思、曼赫姆、哈巴马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提出对意识的广义和狭义的解说，广义的意识泛指一切精神现象，狭义的意识则是精神现象学的最初阶段，其狭义的阐释，“教化”与“异化”概念的提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费尔巴哈则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等则以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了意识形态，这一派认为研究人类社会与研究自然有极大的差别，但不认为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相对立，他们肯定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集团在特定时代，以特定立场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理论，因此，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集团对社会认知的最高理论形式，是社会理论的思想体系，所以，意识形态也称为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论充分开拓和发展起来，因之形成马克思主义，他辩证地对待托拉西和黑格尔这两派学说，兼容并蓄地融汇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中，其最重要的发展是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发展为其意识形态的主体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意义和作用，马克思从事经济、政治和哲学的研究，深入探讨阶级理论，正是他生活时期的经政和社会现实促使他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从经政社会历史和现实出发达致唯物史观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他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简单地说，意识形态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一定阶级或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系统的思想、观念的总体，也即是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思想体系，由它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为一种政治路线，亦为其思想斗争的理论基础。

各社会集团或各阶级之间，必然会产生意识形态的斗争，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同时也强烈地反映在文化、艺术、法律等之中。

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某个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会因其变化而或早或迟地产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它的发展与经济并非平衡一致，历史已经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上往往超越所谓先进的国家，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最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度，接着东欧各国、以及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都是佳例。

时代意识形态大潮与政党

一个政党必有其社会理想作为其主导的政治理念的取舍，从而形成其组党的宗旨，换句话说，某个政党的组成或因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所致，或其依据某种意识形态而生，并具体为其社会理想，且为实现这个宗旨去奋斗。

一个政党因著大环境的变迁和变化中的思潮、即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自然有不同的政治表现，其斗争方向路线便体现出这个政党意识形态的取向。

二战后冷战时期，世界上基本上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这正显现两种绝然相背的意识形态，在战后近六十年的斗争中，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揭示着相互消长的情势，而各自并不断向前发展，从而在特定时期对特定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以美国执其牛耳，社会主义集团则前期以苏联马首是瞻，后期则以中国居主导地位，世界各国的政党基本上亦可按此分类，在其国度或推崇资本主义制度，或主张社会主义改革或革命，并由此产生剧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从劳工党的历史看意识形态对各时期劳工党斗争的影响

今天，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劳工党的斗争，便是试图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斗争的思维基础及其主导政治思想，以取得一个认知。

劳工党从组党到被令结束，也仅仅二十年时光，但却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轰轰烈烈地为祖国做出贡献和牺牲，谱写了马来亚左翼运动可歌可泣和光辉的历史。

1952年至1972年这二十年间，正是亚洲风起云涌的年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变化的阶段。首先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民主独立和解放运动起着重大的激励作用，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斗争的信心和士气。之后，抗美援朝，中国成了反帝的中流砥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胜利，越南共产党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和中印半岛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印尼共产党力量的膨胀和苏加诺政权的左倾，及以反帝反殖为共识的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都在刺激着马来亚劳工党为争取民族民主独立的决心和努力。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不仅仅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剧烈，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斗争，对国际左翼运动产生严重的影响，造成分裂的局面，从而导致某些运动的失策和挫败。从五十年代中期中苏论争开始，一直到中国发起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变化冲击着国际左翼运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劳工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不可避免的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必然要作出明智的抉择，订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斗争路线。

必须说明的是，劳工党不是一开始建立便是一个左翼政党，它原是由一批亲殖民政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共的政客在檳城所发起建立，打的是维护劳动阶层的牌子，具机会主义色彩政党。1954年六月始，才由党内一批具劳工阶级思想、信仰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一些费边社会主义者如陈朴根、李国良等掌握党政。1956年，当时刚萌芽的工团组织，如檳城和柔佛州等地的普通工联以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先后加入，才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应仍属民主社会主义范畴，从事议会宪制斗争。1965年始，由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急速转变，党内发生了斗争路线的分歧，发展为以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结合议会宪制斗争与议会外群众斗争路线的政党。

劳工党二十年的历史如按党组织的发展，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 (一) 1951年5月15日 - 1954年6月4日
草创及泛马劳工党时期
- (二) 1954年6月5日 - 1957年8月30日
马来亚劳工党时期
- (三) 1957年8月31日 - 1965年2月10日
社阵/统一战线时期
- (四) 1965年2月11日 - 1972年11月9日
战斗的劳工党时期

如以意识形态的变化来区分，则劳工党的历史又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 | | | |
|------------------------------|-----------------------|------------------|
| (一) 1951年5月15日 - 1954年6月4日 | 亲殖反共机会主义 泛马劳工党时期 | 议会宪制斗争 |
| (二) 1954年6月5日 - 1957年8月30日 | 反殖民主社会主义 马来亚劳工党时期 | 议会宪制斗争 |
| (三) 1957年8月31日 - 1965年4月3日 | 工农为主导社会主义 社阵统一战线时期 | 议会斗争为主、群众斗争为辅 |
| (四) 1965年4月4日 - 1967年10月20日 | 支部与中央对抗 分裂的劳工党时期 | 议会外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 |
| (五) 1967年10月21日 - 1972年11月9日 | 极左思潮主导革命的 劳工党时期 | 杯葛大选，全面开展群众斗争 |

在上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劳工党在各个阶段的意识形态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国内及国际情势，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影响相关连。

影响劳工党斗争的意识形态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国际的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一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以及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多重影响。始自国内的则是左翼视为革命先锋的马来亚共产党，自三

十年代以来便一直影响着马来亚的左翼运动，其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左翼所崇尚的意识形态同出一源，那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本，立足工农群众，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在各个时期的斗争中，全党上下、各层面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是同时同一的，而是或急进、或循次渐进、或迟缓、或反复、或交叉的复式结构，特别在中苏论战发生之后及接踵而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加上从沉寂中再次活跃起来的马共革命武装和统一战线实践以及继后的内部肃反，这种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猛烈地冲击着劳工党，以及所有的左翼党团组织，以致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斗争都呈现多方和多重的复杂性，它除强烈地影响着劳工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其斗争方向和路线之外，也因此构成劳工党以及所有左翼组织的内部严重分裂，造成左翼运动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劳工党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具体形式

现在让我们比较具体地从各个历史时期来探讨意识形态对劳工党斗争的影响。

劳工党建党于五十年代初，但首四年，由于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党，缺乏一个鲜明的宗旨和立场，之后，其领导人被推翻，原有的党章被抛弃，劳工党才建立成为立足劳动阶级的左翼政党，因此此后十六年的劳工党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但值得重视的是，劳工党毕竟是时代的产物，有那么多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员的加入，才能夺权而使之成为符合党员和群众利益的政党。

其时国际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国内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形势，促使劳工党掀起党内意识形态的革命，才建立了真正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劳工党，这是当时亚非拉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在马来亚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思潮是当时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的意识形态主流，劳工党在这短短的四年间，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意识形态，经由费边社会主义左翼破茧而出蜕变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理想主体的左翼政党，1964年6月5

日，劳工党在檳城召开的代表大会是劳工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以李木生为首的新领导层通过新党章，提出了明确的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八项宗旨，包括建立统一、独立自主及民主的马来亚，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成为劳工党新领导层所采纳的政治基础。

1955年7月27日，劳工党参与联邦自治普选，劳工党由李木生宣布了符合当时局势要求和人民利益的五大纲领，并召开特别大会通过意义重大的32点宣言和16点政纲，这些具体的纲领和政策在在显示劳工党真正代表马来亚各族劳动大众和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其意识形态鲜明而突出，5点纲领，32点宣言和16点政纲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为促进国内和平，要求撤消紧急法令结束紧急状态，要政府接纳马共的和谈建议，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
- 为人民争取平等政治待遇，争取公民权；
- 促外军撤离马来亚，实现真正自治和建立民主的民选政府；
- 修改劳工和职工法令，确保工人利益；
- 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村合作社，改善农民生活。

这些基于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维护工农利益、免除工农遭受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殖民政权的严酷剥削、社会福利政策等都具体地反映出劳工党所崇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起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应是劳工党掀举劳动人民旗帜、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初步阶段，政治斗争采取的是遵循宪制的合法的议会民主斗争路线，此时期紧急法令仍严厉执行，劳工党在白色恐怖主义之下进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竞选活动，依据的是基本的群众路线并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有节制的宪制斗争。

1957年8月31日劳工党联合了人民党组成了社会主义阵线，并于稍后容纳了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此时期，劳工党与人民党均以更为鲜明的旗帜号召工农阶级参与反帝反殖；除遵行议会宪制斗争之外，并主张议会外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群众运动和斗争，社阵的成立是基于统一战线的认识和需要而进行的，社阵成立时发表的五点宣言明确地号召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与外国社

会主义机构合作以推进马来亚社会主义人民阵线的目标”，明确地声明社阵是各民族工农群众为其主导，广泛联合各阶层人民，以形成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1959年8月，社阵中央颁布了《走向一个新的马来亚》的政策纲领，这政策纲领标示劳工党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是社阵为将来执政拟就的「建国方略」，在意识形态上，属无产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形态，其泛种族统一战线体现在其“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纲领条文之中，纲领亦强调社阵作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将遵循非暴力宪制手段去完成其斗争目标，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马来亚。这个纲领总体概括了劳工党自1954年蜕变以来，并在成立社阵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依据马来亚当时的局势和国情而精心制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地落实在这纲领上。

明显地，社阵时期的劳工党无论在意识形态理论，还是斗争方法和路线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阶级意识已经较明显地体现在组织工作上和斗争路线方面，意识形态表现的上升与当时形势相呼应。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就斯大林功过问题的争论渐次升级，1956年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此报告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全文刊载，中国十分谨慎处理此事，继而于当年11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共以一分为二，一面在哲学的高度上批评斯大林在个人崇拜等方面的错误，一面肯定斯大林在苏联伟大成就中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当年12月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就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与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等不同性质的矛盾做了阐释，严明地对待不同性质和敌我矛盾的严正立场和态度，这是中苏在意识形态论争之始，之后中苏不断在兄弟党的居中调停下进行着内部的论争。

1962年，苏共在其22次代表大会上大事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提名再度攻击中共；继后并发动欧洲各国共产党于其代表大会上

“围剿”中共，至此，中苏论争全面升级，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正式开始。1963年1月5日，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一文正式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这期间，许多论战文章都通过电台及报章全文发表广为流传，全世界共产党人及左翼皆涉入并依此分化成不同阵营，东南亚各国左翼基本上一致站在中共一方，批判苏修，其时，社阵，特别是其基层领导干部和群众，不可避免地深受这个意识形态论争的影响，从而在本国此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采取积极的反应，尤其在社阵后期，党内党外意识形态斗争渐次升级。

1962年大马合并计划的提出，及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与因之而起的印尼对抗，使国内外矛盾逐步激化，面对强大的群众力量及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反大马计划、反兵役等政治与民间为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斗争，联盟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是加剧对社阵和左翼党团以及民间反对力量的严酷镇压，多次进行大逮捕行动，社阵及左翼党团的重要领导人纷纷入狱，其效应不仅严重削弱了社阵的领导层，并造成人民党与劳工党因语文教育问题的分歧而分裂，社阵于1965年12月10日因人民党的退出而结束了其历史任务。

1965年是劳工党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分水岭，1965年之前，劳工党对宪制斗争仍充满信心，采取的是议会斗争为主，议会外群众斗争为辅的宪制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联盟政权的全面镇压和逮捕行动试图全面瓦解劳工党（与社阵）的力量，这种行动基本上堵塞了劳工党宪制斗争的道路，于是于1965年2月始，劳工党议会外群众斗争全面升级，这种改变鲜明地昭示着劳工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上的重要变化。

1965年2月13日劳工党为纪念社阵前主席波斯达曼及其他同志被捕，订2月13日为马来亚人权日，作为争取人权的斗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这是劳工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运动，并在严酷镇压下取得辉煌胜利，这是在1964年大选挫败后敌我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劳工党采取的突破镇压的斗争形式，落实议会外群众斗争路线和目标，2·13斗争胜利影响所及，劳工党各分支自此崇尚议会外群众斗争形式，坚持群众斗争路线，全面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斗争。

1963年新加坡的闪电大选以及马来西亚1964年的大选，新加坡社阵及大马社阵均遭挫败。前此由于对大选的期望过高，劳工党内部对大选及大选前后形势进行检讨，开始对“议会迷”作反右倾思想批判。与此同时，也对宪制斗争的前景抱持不乐观的态度，并认为联盟政权蓄意堵塞宪制斗争的道路，就必须发动议会外群众斗争，以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

1965年4月4日劳工党霹雳分部发表《党今后的斗争路线和斗争策略》，宣称国内局势已“产生根本的变化……马来亚人民的反殖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新阶段”，由是产生了劳工党内部，特别是中央与支部对斗争路线的论争。文章认定“现阶段的斗争是广泛性的群众斗争结合议会斗争的形式”，因此在策略上，主张“应多运用激烈的形式”。接着，于4月17日，霹雳州分部又发表了题为《迎接伟大的斗争》一文，直接指责党中央领导不能配合局势的发展，“阻碍了党的发展和斗争”，认为联盟政权无限期延长地方议会和市议会选举、连续大逮捕的镇压行动以及封禁柔佛州笨珍及马六甲阿罗亚也等四支部，证明宪制斗争的道路已被堵塞，强调“只有针锋相对的群众斗争才是有效的”，从而提倡“实力斗争”。继之，霹雳州分部批判中央背叛左翼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从而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事实上，劳工党霹雳分部已开始抛弃议会斗争手段，不顾中央的劝阻和可能遭遇中央的纪律制裁，开展宣传运动（称为红七月运动）和一系列激烈的群众运动。旋而遭到严酷的镇压。11月28日于双溪古月展开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时，金保支委唐保光遭镇暴队毒打而壮烈牺牲，引发全国的抗议行动。

霹雳州分部从批评党中央到与中央直接对抗，从斗争路线的论争发展到了思想路线的分歧，明显地说明意识形态的斗争已从党外转入党内。这个斗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党中央五巨头呈辞。国内外、党内外形势的急变逼使党中央领导必须检讨党的政策、斗争策略和方向。继之，于1966年7月1日，劳工党宣布于9月24日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大会秘书处向各支部发出将于大会提呈的《我国社会和党的路线》草案和《党的一般纲领》两个文件，草案确定

当时马来亚仍属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而不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时要求以科学的工人阶级思想统一全党思想，使党由社会民主党革命化为工人阶级的党。对宪制斗争，主张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而把重点放在议会外斗争上。这些主张，在9·24特大获得接纳，通过了《我国的社会与党的斗争路线》这份重要的文献和六项提案，确立了议会外群众运动为主的斗争路线。之后，劳工党便开展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霹雳州分部的反右运动，一些州支部这一两年来对党中央政策和独断作风的不满，新加坡社阵与左翼工团从口号之争发展为思想分歧，以及党外一些地下组织的引导等多重影响，劳工党的内部分歧全面扩大化。1966年底，雪兰莪州劳工党八支部、柔佛州七支部，先后成立反右支联。嗣后，反右支联并举行代表大会。雪州反右八支联更成立雪州反右新分部。自此，在新加坡社阵及工团极左路线的影响之下，雪州新分部、柔佛州反右支联、人民党雪州分部同以电总为首的反右左翼工团联合成反右阵线，与劳工党中央划清界线，展开反右批斗运动。

明显的，党中央虽然已采取较前激进的斗争路线，并确立了群众斗争路线，并以之作为斗争重点策略，也开展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与当局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如援越抗美运动，三反示威游行，“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游行示威，檳、吉、霹洩海渔民海上大示威等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却仍无法化解这些支部反右运动，争取他们回归中央的领导，他们仍然以极左的革命的斗争路线和行动与之分庭抗礼。

无论是劳工党中央还是支部领导和基层干部，这斗争路线的分歧和发展，明显地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中印半岛蓬勃发展的革命解放战争趋向胜利之形势、国际以中共为主的反苏联修正主义、反帝反殖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亚非拉风起云涌、国内形势亦产生新的斗争形势。马来亚共产党于1965年初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并在椰加达设立支部。于1965年3月5日发表宣言呼吁粉碎马来西亚，实现马来亚的真正独立而斗争。新加坡社阵则退出国会，进行议会外斗争；社阵主席李绍祖获选为亚非反帝反殖机构

主席，对形势估计无限膨胀并对大马境内的宪制斗争采取干涉的态度，影响和加剧了劳工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造反派对党内党外采取过激的斗争，并把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放到了斗争的第一位。

1966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第一张大字报，发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在文章中被提到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形成所谓的“意识形态中心论”，阶级斗争自50年代反右扩大化以来，到了文革时期越发不可收拾，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形成一股极左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此时的毛泽东思想正代表著这激化了的意识形态，文革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对东南亚左翼运动的影响尤烈，造反批斗之声无处不在，劳工党和所有左翼党团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著批斗运动，深深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旋风之中。

鉴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在1967年10月檳城劳工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以许启针为首的新领导层，在主席演辞中对形势作了很具代表性的分析，认为此时国际形势“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形势一片大好，应高举打倒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红旗，对国内形势则除重新强调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原群众斗争路线外，也不讳言：“如果完全放弃议会斗争更能打击和暴露反动派的假民主反共丑恶嘴脸”则将加以执行，演词对党则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社会主义政客以及“形左实右”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大会的《政治报告》强调“搞好思想革命化，迎接斗争大风暴”，议决案则要求在处理路线分歧问题上，党必须分清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议决案亦明确地声明党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能够有助于推动马来亚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党，即有能力参予推动马来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

这个大会充满革命激情，这时劳工党已经准备转型为以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党。

13大胜利召开之后，于11月24日，劳工党动员群众，领导了起于檳城的反旧币贬值的总罢市运动，规模之大震撼全国，这次群众斗争确实贯彻了党中央新政治路线最成功的实践。

1968年1月16日，吉打州分部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的文章，明显地酝酿议员辞职和杯葛大选，1968年6月4日，吉打州分部又再发表指导性文章《劳工党吉打州分部对1969年大选的意见》义正词严地主张杯葛大选，9月28日及29日，党中央召开各州代表扩大会议，除彭亨州外，各州都要求杯葛大选，1969年5月当林顺成被枪杀及5月9日出殡游行，杯葛大选的情绪和运动推向最高潮，接著，有人蓄意发动5·13种族屠杀事件，马来西亚进入了第二次紧急状态，所有政治运动都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主义之下，劳工党各分部及支部领导人被捕大半，有些人则被逼上梁山，投入马共武装斗争的队伍。

1972年9月社团注册官以党多年没呈报常年报告，正式吊销劳工党的注册，劳工党的斗争正式结束。

除文革意识形态中心论的影响之外，国内急转直下的局势，劳工党许多支部领导和基层党员群众对宪制斗争失却信心，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转而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其时，自发性的数个地下组织，开始十分活跃起来，其中全马性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发展特别迅速，成员众多，其他尚有“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解盟）、以檳城为基地的“爱国主义阵线”（爱阵）和以雪兰莪为主要活动基地的“马来亚独立同盟”（独盟）以及在柔佛发展起来的“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同盟”（新青盟）等组织，这些地下组织或由转入地下的前劳工党基层领导干部和党员自发组织，或吸收了许多劳工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各地下组织都先后与马共产生了联系，有些成员被吸收为民运的干部，或直接参与马共南下突击队的游击战斗。

可是马共本身由于1968年始的内部除奸肃反运动扩大化，造成严重分裂，而有革命派、马列派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一党三分的局面出现，直接间接地造成地下组织的分裂，从而扩大到其他左翼党团组织之中，文革的批斗方式于1966年中期以后在左翼党团组织之中盛行一时，严重破坏了左翼内部的团结，“怀疑一切”、“造反有理”、无限上纲上线、无政府主义、无序的批斗破坏了党纪，冤枉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党团组织各层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

搞乱了群众组织，灾难性地破坏和分散了左翼的力量。劳工党在1965年中期以后便进入了类似的过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内部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严重的内耗终导致左翼运动的失败。过左的思潮和行动也使劳工党相对地脱离马来西亚的经政现实，脱离群众，自我孤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原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演变到文革后期，其意识形态中心论则已远远脱离唯物主义而掉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劳工党1969年3月15日由中央秘书处发布的一篇文告《坚决抵制伪“大选”打倒美英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拉、李反动集团》十分典型地总结了被迫结束活动前之劳工党极左意识形态。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劳工党在后期，即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重要领导被捕的被捕，在逃的在逃，上山的上山，领导层对党基本上有失控的现象。极左浪潮席卷了党的基层干部，引导走向偏激和主观主义，不能冷静地观察当时的局势，审视延续宪制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当时有些领导认真要持续宪制斗争可行的观点亦无能扭转全党走向极左的结局。

时空对话与历史视野

-- 读《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感言

● 张应龙

(中国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教授)

评价劳工党的历史，无法简单地用对还是错加以衡量，需要从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来予以观照。有人说，对一个政党在执政前的奋斗与执政后的行为需要分开来看，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同理，对一种理想的追求和理想的实现也需要分开来评价，不能因为理想没有实现而否定追求理想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因为追求理想过程的缺陷而否定理想的崇高。

一、青灯传史与历史文本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

因为在古今中外，对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事件，平民百姓能读到的文本，大多数是胜利者行使诠释权编写出来的历史。这些历史被尊为“正史”，民间编写的文本被称为“野史”或“稗史”。“正史”是供老百姓“拜读”的，地位崇高。至于“野史”和“稗史”，老百姓只能私下传阅，有时还冒着危险。编写“正史”的人是“学术权威”，而编写“野史”、“稗史”的人不但没有稿费，有时还被杀头。中国古代统治者就通过“文字狱”来惩戒不听话的“子民”。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官方机密”为由将历史的真相尘封起来，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解密，以至历史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黑白颠倒。中国古代有当朝人不写当朝史的传统，要等到新王朝起来后才写前朝史，这样说来，“官方机密”保密法还是中国人的老祖宗发明的。由于历史常常没有“真相”，草民布衣便对“历史”产生失望的情绪。

幸运的是，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这也是“天赋人权”。自然科学研究是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面对复杂纷纭的“历史”，人们自然不会

满足于若干“正版文本”，总是有人锲而不舍地研究探索，敢于侵犯“知识产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不能见谅于世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最有价值和最有生命力的，如哥白尼的学说等，那些在当时红到发紫的“成果”却最容易变成过眼烟云，成为文字的垃圾，但是，追求真理，探索科学，拨开迷雾，说来容易做时难，它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忍辱负重的毅力，需要不计名利的淡薄，青灯传史，方能久远。

二、忘却的历史与历史的发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既有激情又有理性，既有大规模的群众抗争运动又有和风细雨的政治协商（虽然有时也暗流汹涌），不同政治色彩的组织在不同的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鲜活的“剧目”，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

在战后马来西亚人民组织了不少政治组织，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有的已经消失，劳工党就是其中之一，劳工党不但消失了，而且还变成“禁区”，如果说劳工党是一个不起眼的政治小组织，那么它被历史遗忘还有一点逻辑性，可是劳工党在五十年至六十年代是马来西亚一个强势政党，其政治动员能力为其他政党所难以望其项背，忘记历史很容易又很难，劳工党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印记却无法磨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掀起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浪潮，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政治力量以各种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这种历史的合力使马来西亚终于取得了独立，独立后的马来西亚面临着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经济、处理民族关系等问题，而且在独立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民主政治制度与民族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各种政治力量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动员组织群众一起为之奋斗，于是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如果说，获得独立是一个国家的新生，那么建立和谐进步、民主平等的新机制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所以，那些曾经为马来西亚的独立与民主奋斗过的政治组织，其历史功绩理应受到历史的怀念，可是，在五十年至六十年代曾经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劳工党自一九七二年被取消注册以

后似乎被历史所遗忘了，劳工党的本来面目在岁月时光洗刷下变得模糊不清，偶尔出现的评述和回忆，也无法让人看到其全貌，反之有时只见到被扭曲的“狰狞面目”。

这也没有什么出奇，因为劳工党“在世”时就被当权者当作“异端”而加以妖魔化和无情打击，劳工党被取消注册后也一直“冷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整理劳工党或其他左翼组织的历史当然困难重重”（第1页），这种历史后果就是有关这段历史的论述，其公信力常常受到质疑，九十年代后，随着马来西亚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劳工党的历史尘封开始被小心翼翼地揭开，近几年，甚至马共的问题也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劳工党的历史重新被“发现”。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终于在新千年之际与世人见面，这是来之不易的成就，它凝聚了许多老劳工党人的心血，是劳工党人对历史的激情追求和理性梳理的结晶，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这部著作利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少是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劳工党的兴起、变化、发展与结束的历史，附录了很多劳工党的原始文献，重新展现了这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虽然人们对其中的论述有不同的观感，但这部著作的出版像打开历史的大宅门一样，让读者从中获得对这段历史的新认知，使劳工党“重新”进入历史的视野。

在马来西亚政党中（无论现存的还是已经不存在的），还没有一个政党出版过如此完整的党史，因此，从学术角度上看，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令人鼓舞的重大进展。

三、历史足迹与精神遗产

马来亚劳工党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初名泛马劳工党，在此之前，已有几个州的劳工党成立了，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改名马来亚劳工党，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与马来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联合组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社阵解体，“五一三事件”后劳工党基本停止活动，至一九七

二年被取消注册。

劳工党成立时正是马来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不断高涨、英国被迫推行议会政治的时候。劳工党组成社阵时正是马来西亚联合邦成立之时，社阵与联盟形成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虽然社阵才存在八年，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反对党联盟象社阵那样的强有力和坚持那么长的时间。一九六八年底劳工党抵制大选后不久马来西亚就爆发“五一三事件”，劳工党应该说与“五一三事件”没有什么牵连，“五一三事件”爆发的原因有许多版本，但是，如果联系六十年代以来联盟政府对劳工党和社阵的镇压，那么“五一三事件”的爆发就有著一种历史推进关系，不是偶发，是一种“事物”发展的逻辑演绎，因此，劳工党的历史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变化史的轨迹，它与马来西亚的命运相联系。

劳工党的历史是斗争史。“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是劳工党人的旗帜。由于劳工党坚持反联盟、反大马的立场，联盟政府不断利用“内安法令”逮捕劳工党干部和查封劳工党组织，劳工党很难循议会斗争道路伸张其政治理想，从而激发劳工党人的反抗情绪。一九六五年劳工党发起“二一三”争取人权日大游行，揭开群众斗争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九月劳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终于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路线。斗争、被捕、入狱、牺牲是那个时候的话语“关键词”(key words)。

劳工党的历史是建设史。任何斗争都有某种理想作为前提和目标，都是为了理想而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斗争只是达致理想的方法或手段。为了某种理想的斗争，其实是为了建设某种理想，只看到斗争的形式没有看到建设的内涵是不完整的。劳工党的理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当时令人响往的目标。许多青年人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才加入劳工党的行列，才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洪流中去。假如不是为了这种理想，那么多人那样的奋不顾身、不计名利是无法想像的。劳工党的目标劳工党自己未能实现，但劳工党追求奋斗过的有些具体内容后来实行了，星移斗换，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那时却要付出艰难的努力，而且还不能实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抚今追昔，更

令人深刻体会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含义。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二年这二十一年中，劳工党的政治路线“由最初的亲殖反共、作为英殖民主义者民主橱窗的机会主义政党，逐渐蜕变为反殖亲工农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最后准备转型为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左翼政党”，劳工党的斗争形式“由偏重议会选举的议会道路，转向批判合法主义和议会迷，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宪制斗争路线和策略方针，最后则倾向于放弃议会斗争，并以持续的群众斗争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第六八五页）。评价劳工党的历史，无法简单地用对还是错加以衡量，需从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来予以观照。有人说，对一个政党在执政前的奋斗与执政后的行为需要分开来看，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同理，对一种理想的追求和理想的实现也需要分开来评价，不能因为理想没有实现而否定追求理想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因为追求理想过程的缺陷而否定理想的崇高。

有人将劳工党的历史称为血泪史，如果从受迫害程度来看此言不差，但这缺乏价值层面上的考量，是一种“通俗唱法”，不是“美声唱法”或许换个角度说，用斗争史来概括劳工党的历史更符合劳工党的精神底蕴。

劳工党是奉行“反帝反殖反封建官僚统治，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多元种族政党”。劳工党的政治理想感召著许许多多热血青年，劳工党的政治活动吸引了许许多多青年人的参与，“具有广泛的草根性和群众基础”（第V页）。尽管随时都有被抓入狱的危险，但许多青年人仍以加入“身穿白衣蓝裤、蓝裙的热情奔放的劳工党党员行列”为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火红年代。

劳工党揭举社会主义大旗，坚持反联盟、反帝的立场，主张走群众路线，其党员和政治追随者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召开演讲会，举行示威游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建立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忘我地奋斗。作为反对党，他们没有津贴只有迫害，但为了理想，他们不怕坐牢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敢向前。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无畏年代。

在马来西亚各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象劳工党一样受到那么

持续、广泛、残酷的迫害，是最多党员“光荣入狱”的政党，但劳工党人没有退缩，抓了一批就补上一批，进了监狱仍然以监狱作为新的斗争场所，“洪炉火中出真钢，英雄来自斗争场”，那是一个不怕牺牲的浪漫年代。

“主张民族团结，突出阶级斗争”的劳工党虽然成为历史，但劳工党的政治文化对后来其他华人政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没有成为历史，虽然劳工党自身也犯了错误，但劳工党人的理想、追求、实践仍然让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激动不已。

劳工党当然是马来西亚历史的一部份，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它也是时代的产物，笔者认为，从相对意义上说，二战后至五十年代是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时代，六十年代是理想斗争的时代，七十年代是思想调整的时代，八十年代是经济发展的时代，九十年代以后是全球化时代，劳工党所处的时代正是充满著理想、激情、斗争和献身的时代，那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正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冲刷著全球，就是在美国，黑人运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使许多“新人类”投身于这个运动，马丁·路德·金那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而且各个国家的理想斗争又有不同的历史命运，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追求、斗争、理想是劳工党留下的历史足迹，

激情、奉献、牺牲是劳工党留下的精神遗产。

（编按：本文原载于《人文杂志》2001年五月号）